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概论

吴肃民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K204
W864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概论

吴肃民 著



62879

(津)新登字 007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概论

吴肃民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三河市印刷厂 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 字数 180 千字

1995 年 6 月第一版 1995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 册

ISBN7-80504-460-0

R·161 定价:9.80 元

自序

1982年，我奉命专职从事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迄今已整整15年，占去人生有效年龄的四分之一。亲身经历了民族古籍事业开基的艰辛，兴起的繁忙，发展的困惑。

15年的酸甜苦辣，使我真正领悟到古籍的深层内涵，也使我无怨无悔地献身于民族古籍事业。倘人有来生，我仍要从事民族古籍。

从事民族古籍，永远不会产生社会的轰动，只能是默默地耕耘。为明天和后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沃土上，留选丰收的良种。

从事民族古籍，必要有三甘精神。甘做铺路石，甘为人梯，甘坐冷交椅。

这本《概论》，是从1984年以来，在我讲授古籍知识的讲稿基础上，经过整理修改完成的。欲从宏观的角度，对古籍和民族古籍做一概括的论述；使年青的民族古籍工作者，对民族古籍及其收集整理有个粗浅认识。我从事民族古籍虽然15年，但对民族古籍工作整体来说，还处于初级阶段。无论是收集，还是整理，均未形成民族古籍自身的方法和理论。因此，在著述《概论》时，除去能见到介绍某个民族的古籍资料外，几乎无可借鉴。目前，关于民族古籍的收集、整理和版本鉴定等，基本是循习汉文古籍整理的有关学科与方法。故本书在介绍汉文古籍的有关知识方面，比

F04P / 0P

重大一些。其目的，在整理民族古籍时，以资借鉴。

倘论本书的突出之处，窃以为是对民族古籍的分类。时下，民族古籍整理的各大方家，对民族古籍的分类，多用现行学科的自然分类。从民族古籍编目的角度来看，这种分类，实为不便。若对一个民族的古籍来说，或是可行的，但对民族古籍整体说来，难以“辨章学术，考境源流”。故本人大胆提出民族古籍的四部分类法，即分“宗教部”、“史书部”、“著译部”、“口碑部”四大部，部下再分若干类（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这也是受《四库全书总目》四部分类法的启示。妥否，还有待专家验证、指导。

另，本人鉴于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开展之现状，提出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见第四章第一节）。当否，也待实践的验证。

本书既称《概论》，除对有关民族古籍内涵、整理的意义和方法论述外，对各个民族古籍的概述，也势不可少。55个民族，古籍多寡不一。本书只能非常概括介绍，对古籍宏丰的民族，考虑篇幅，更只能简而概之地述及。即便如此，全书的篇幅比重，也似有失调。不足之处，只有留待今后修订或由他人完善了。但愿本书能抛砖引玉。

《概论》完稿过程中，深得老师张公瑾先生的指导；也得到严宏、于萍海二同志的大力协助，提供西南、中东南地区的民族古籍概述资料并帮助校稿。沙平及本研究所的其他同志也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许纫珊先生和天津古籍出版社的林雄等诸多同志对本书一直予以关注，早在1986年就曾约稿。

金木同志，在百忙中承担了全部抄稿工作。

好友祁振华对《概论》的付梓尽了力。

本书更承蒙了全国民族古籍办李东升、李晓东二位同志的多方关照。

本书写作过程中，参考了许多著作并有引用之处，附书后参考书目。

总之，《概论》的面世，是集体的力量，是与上述众位的帮助分不开，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谢意。

水平有限，望专家、读者指教。

吴肃民

1995年6月23日于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研究所

目 录

自 序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古籍与文献的内涵	(1)
第二节	汉文古籍文献	(2)
第三节	民族古籍的内涵	(1 2)
第四节	整理民族古籍的意义、目的及民族古籍 的特殊性	(1 6)
第二章	民族古籍概况	(2 2)
第一节	东北地区（含内蒙古地区）民族古籍概述	(2 3)
	蒙古族	(2 3)
	满族	(3 3)
	赫哲族	(4 0)
	达斡尔族	(4 2)
	鄂温克族	(4 3)
	鄂伦春族	(4 4)
	朝鲜族	(4 6)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族古籍概述	(4 7)

维吾尔族	(4 8)
哈萨克族	(5 3)
锡伯族	(5 6)
柯尔克孜族	(5 8)
乌孜别克族	(6 0)
塔塔尔族	(6 1)
塔吉克族	(6 3)
俄罗斯族	(6 4)
回族	(6 5)
撒拉族	(6 8)
土族	(6 9)
裕固族	(7 0)
东乡族	(7 1)
保安族	(7 3)
第三节 西南地区民族古籍概述	(7 5)
藏族	(7 5)
门巴族	(8 0)
珞巴族	(8 1)
羌族	(8 2)
彝族	(8 4)
白族	(8 7)
哈尼族	(9 1)
傈僳族	(9 2)
佤族	(9 5)

拉祜族	(9 6)
纳西族	(9 8)
景颇族	(1 0 1)
布朗族	(1 0 2)
阿昌族	(1 0 3)
普米族	(1 0 4)
怒族	(1 0 6)
德昂族	(1 0 7)
独龙族	(1 0 9)
基诺族	(1 1 0)
傣族	(1 1 1)
苗族	(1 1 5)
布依族	(1 1 9)
侗族	(1 2 2)
水族	(1 2 5)
仡佬族	(1 2 7)
第四节 中东南地区民族古籍概述	(1 2 9)
壮族	(1 2 9)
瑶族	(1 3 3)
仡佬族	(1 3 6)
毛南族	(1 3 8)
京族	(1 3 9)
土家族	(1 4 0)
黎族	(1 4 4)

	畚族	(146)
	高山族	(147)
第三章	民族古籍的收集与整理	(151)
第一节	民族古籍的收集与编目	(151)
第二节	民族古籍的整理与方法	(172)
第四章	民族古籍研究的宏观与微观	(193)
第一节	对民族古籍宏观的研究	(193)
第二节	对民族古籍微观的研究	(203)
附录:	民族古籍历程的回顾	(213)
	参考书目	(222)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古籍与文献的内涵

什么是古籍，古，故也。籍，书也。古籍即古书。收集整理古籍，亦即收集整理古书。古，是个时间概念，不同时期，对古籍的“古”的时限界定也不同。“文革”前，界定古籍的时间下限为明末。而“文革”后学术界对古籍的时间下限却有了三种主张。一是按史学界对中国通史阶段划分法，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为限，即：1840年以前的书均为古籍。二是主张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因它标志着中国新文化的开始，此前可视为旧文化，自然此前的书统属古籍。三是主张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限。因为辛亥革命推翻了旧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亦即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目前学术界基本上采用了这个时间下限。以1911年为界，能比较完整地体现出古籍的内涵，即从奴隶社会到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文化遗产。

讲古籍往往与文献联系在一起。古籍是指古书，而文献的涵意较古籍更广泛。文，系指文字资料，献，系指贤人的言论。“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音义），古代乐舞的行列，一行八人为一佾。奴隶制社会用舞蹈人数的多少表示奴隶主贵族之

间的等级差别。所谓“天子八佾”，即天子的舞队共有六十四人。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这里的“文献”，系指历朝的文件和当时贤者之言。后来，“文献”一词的概念有了变化，一般单指历史文件而言。而发展到今天，“文献”一词涵意更广，一般泛指所有记录知识的印刷型与非印刷型的出版物和其它特种文献。现在我们所说的古籍文献，系指清末以前的雕版、活字版和手抄的古籍文献，其中包括文书、卷册、碑铭、拓本等。

中国的古籍文献可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其卷帙之浩繁，内容之丰富多彩，在人类文化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内涵包容极其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民族、语言、文学、艺术、史学、哲学、法学、农学、医学、科技、外事、方志、民俗、谱牒及宗教经典等等，可以说包罗万象。

第二节 汉文古籍文献

中国的古籍文献，就现行的形式可分为汉文古籍文献和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本书虽然是讲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但同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在述及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之前，首先介绍一下汉文古籍文献也是十分必要的。目前生活在中华民族这块国土之上，各民族的文化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共同发展的。只不过因为历史的原因，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不一，文化发展亦不平衡而已。但做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五十六个民族对丰富祖国的文化宝库，都尽了自己的责任，做出了贡献。但也

必须看到，在五十六个民族中汉族文化是占据主导地位，尤其在古籍文献的收集整理领域，汉文古籍文献更在前茅。所以，了解汉文古籍文献的历史与现状，对了解以及收集整理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是有着特殊意义的。

汉文古籍文献的形成，按一般通用说法，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以前殷代的“甲骨文”和“金文”。甲骨文是当时史官保管的重要文献。之所以称“甲骨文”，是因殷代的奴隶主为了占卜吉凶祸福而将文字刻在龟甲和牛、羊、鹿、猪的肩胛骨上，故曰“甲骨文”。“金文”又称“钟鼎文”，即当时人们在青铜器物上刻铸的字，亦称“铭”，后人称为金文。甲骨文与金文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甲骨文时代虽早，但被发现却相当晚，1897年开始发现，至今仅90余年。目前国内有40个城市、90多个单位收藏甲骨达十万余片。

金文迄今发现有七千多器。

甲骨文和金文都是零散的，是文献，而不能称其为书（籍）。我国最早的书籍是简策和版牍。简策是将竹子断成筒而后劈成片，经过“杀青”后用来书写。单片称为简，将简编连一起称为策（册），通常一策（册）即为一篇完整的文章。今天我们称书的量词为册，就是由此而来。在编连策时，一般用麻绳、丝绳和牛皮绳。用麻绳和丝绳的称“丝编”，用牛皮绳编连成策的称“韦编”。编有二、三、四、五编之别，即指在编简时是用几道绳子编连而言。

筒的长度不一，有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八寸，六寸之分。秦

汉时期，习惯用最长的简写经典著作；用一尺二寸的写“孝经”，而短的因携带方便，于是用于记事或其它。

版牍是将树木制成版，以便于书文与绘图。木版的面积即长与宽的比例，常见的是三比一，也有成正方形的。因木版非正方即长方，故又称“方”。最长的木版长约三尺，称为“槩”，二尺长的称“檄”，一尺长的称“牍”，五寸长的称“传”。由于木版的面积不同，所以能容写的字数亦不同，有的可写几行甚至十多行，有的只能写一行，实际上成了木简。木版一般用以写公文、通信或绘图等。除木简外一般不用作写专著。《仪礼·聘礼》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名”即指字，这就是说百字以上的文章用策，百字以下的文章用方牍。一般通信常用一尺长的“牍”，所以后来书信才有“尺牍”之名。书写公文与书信的版，往往再用一块同样的木版作盖用，作盖的木版称为“检”。书写好的木版加上检后捆起来又称作“函”。现在使用的“公函”、“信函”之称就来源于此。在检的版面上写收函与寄函人的姓名，称“署”。木版的面积比竹简宽大得多，因此又常被用于绘图，故而迄今称表示国土的地图为“版图”。

简策与版牍较之甲骨无疑是大大进了一步，但仍是笨重，不仅翻阅不便，携带更为麻烦。西汉文学家东方朔给汉武帝写了一篇奏章，共用了三千根竹简，要由两个壮实的人才能抬进宫去，可见使用之不便了。

春秋战国时期，在使用简策与版牍的同时，又出现了“帛书”与“缣书”。即把字写在丝织品上，携带与保存都比简策与版牍方便，但价格昂贵，因此“帛书”、“缣书”不能象简、牍一样

普遍使用。1974年湖南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其中有“老子”、“周易”、“战国策”、“左传”、“天文占星”、“医经”、“相马经”等二十多种，总字数达十二万字。

无论是简策、版牍，还是帛书、缣书，都是产生在世界上还没有发明纸的时候。我国是世界上发明造纸的国家。发明造纸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没有纸的发明，人类文化的传播就要受到影响，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都要受到影响。因此，纸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科学发展及人类的社会进步作出的一项十分重大的贡献。

按一般的说法，纸是东汉宦官蔡伦于公元105年发明的，但近半个世纪在新疆、陕西、甘肃先后四次出土了西汉时期的古纸，这就是说纸的发明不是在东汉，而是在西汉就有了。据说古文献中也有此记载。

在我国未发明纸之前，世界上其它国家人民也都曾千方百计地寻找各种书写材料，罗马人用过蜡板，埃及人用过纸草，西亚人用过泥板，小亚细亚人用过羊皮，印度人用过树枝和棕榈叶。

我国发明的造纸法首先传入朝鲜（魏晋时期）。而后，公元610年又从朝鲜传入日本。公元751年（唐玄宗天宝十年），向西传到阿拉伯。公元1150年，又从阿拉伯传到欧洲。十六世纪后，又由欧洲传到北美洲。之后，逐渐传遍了全世界。

我国发明造纸后，在西汉末东汉初，开始有纸书。到了晋朝，纸书完全取代了简牍帛书的地位。纸书的最初形成沿袭帛书，先把几张纸粘连起来，成为一横幅，然后两边各用一细木棍做轴，以便于卷起。纸上画成直格，书写后由尾向前卷成一束，叫一卷。一

部书有许多卷，为避免散乱和便于保护，外面用麻布或丝织品包装起来，这就是帙。卷帙浩繁的“卷帙”也就来源于此。

1924年和1965年，在新疆地区先后发现了两份晋人抄写的纸本《三国志》残卷。目前为止，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纸卷书。这种卷轴式的书，从汉代一直沿用到北宋初年，直到雕板印刷术发明后，才逐渐演变成册页形式的书。册页形式的书是经过纸书卷轴装、纸书旋风装、纸书经折装、纸书梵夹装等形式后发展到最初的蝴蝶装（始于五代盛于宋代）。之后逐渐发展到包背装，（流行元、明两代）。大约在明朝中叶，在包背装的基础上又产生了线装。这种线装装帧一直延用到清末。民国以后，乃至今天，有的为了保持原书原貌（如影印出版的古籍），或因某种特殊需要，仍在用这种装帧形式。在今天看来，线装的形式，几乎是古籍的一种标志了。

书的装帧形式的发展是与书的制成密切相关的。从汉文古籍文献的形式上概括，汉文古籍文献有甲骨、钟鼎文，写本（这里专指策牍、帛书、缣书和二至十世纪——特别是隋唐两代手写的纸本）、刻本、活字本和抄本。

刻本也叫刊本，就是雕版。据有关资料记载，雕版始于唐初，（公元七、八世纪）。到了唐代，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对书籍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这就势必要求印刷术有相应的发展。雕版印刷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是在印章和碑拓的基础上产生的。由于雕版的出现，书籍印的又多又快，自然又反过来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与传播。雕版是由一整块木板雕刻成一块版面。唐末宋初，雕版印刷已相当发展和普遍。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

年)，宋太祖派人到成都主持雕刻《大藏经》。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雕版十三万块，五千余卷，这就是著名的《开宝藏》（亦称蜀版藏经）。随后又有福版、浙江思溪版、碇砂版的《大藏经》。由此可见宋代雕版印刷术发展之一斑。

宋代分北宋（公元960—1126年）和南宋（公元1127—1279年）两个时期。北宋刻书中心主要是在京城汴梁（今开封）、临安（今杭州）、福建建阳、四川成都及眉山。由于金兵进占中原，北宋刻本大都佚失。存下的极少，已成为极其珍贵的版本。南宋时期雕版业几乎遍布江南各地。但著名的刻本是以浙江省、福建的建宁府和建阳县及四川省的刻印本为代表。浙江省的称浙本，福建的建宁、建阳本称建本，四川的称蜀本。

宋刻本的字体有欧体（欧阳询）、柳体（柳公权）（这两体属瘦体）和颜体（颜鲁公属肥体）。浙本多欧体，建本多柳体，蜀本多颜体。宋刻本的中缝下端有刻主的姓名（有的只刻姓，有的则只刻名）。现存的宋刻本中缝处下端若没有刻主的姓名，多因当时是蝴蝶装，中缝内粘破损或因虫蛀的缘故。宋刻本中除官刻本外，私刻本、坊刻本还多刻有牌记（牌记内一般刻有刻主的堂名、人名，有的还刻有刻书的年月）。

南宋刻本中，坊刻本为追求利润，刻印快速，开始采用简体字。

南宋是与金并存的，北为金南为宋。北宋时期的刻书中心，在金时，由汴梁转移到山西平阳（又称平水，今临汾）。平阳书坊极为发达，多刻有医书、类书和说唱调等。皇统八年（公元1148年）开始雕刻，大定十三年（公元1173年）完工的《大藏经》